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秦汉史学思想卷

汪高鑫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秦汉史学思想卷

汪高鑫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秦汉史学思想卷/汪高鑫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06-6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②史学
思想—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9936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秦汉史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QINHAN SHI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汪高鑫

责任编辑: 史霄鸿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06-6

定 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汪高鑫，安徽休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与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出版学术著作《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中国经史关系史》《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等近30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或参与主持国务院、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和教育部人文规划基金等各类项目近20项。科研成果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等各种奖项10余项。

◎ 责任编辑：史霄鸿
◎ 美术编辑：陈培亮
王 玮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system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秦汉历史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具有自己的特点，^{〔1〕} 有三点可以提出来：一，汉族形成；二，民族意识增长；三，秦汉时期是封建关系的成长时期。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包括史学在内的汉文化，本身就是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产物。我们应当用开阔的眼光认识《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两汉史学。《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遗产是用汉文字写出来的中国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结晶。在封建关系成长时期产生的秦汉史学，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史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从文化源流上说，秦汉时期史学是在诸子学的受挫、复兴与嬗变中形成的。^{〔2〕} 先秦时期的史官文化与百家争鸣，孕育出中国民族史学的基

〔1〕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第六章最后一段指明了这个时期的特点：“秦汉时期封建关系的成长，使得在广大地域上生活的语言基本接近的居民，在经济生活上更加靠拢了，民族意识也在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族形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6页）

〔2〕 侯外庐先生说：“董仲舒不仅是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创建者，而且是封建制思想统制的发动者；不仅是中世纪正宗思想的理论家，而且是封建政治的实行家。……因此他对古代‘子学’做出了否定，为中世纪‘经学’开拓了地基。”（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8页）可以说，董仲舒是从汉初子学演变出新经学的学者，而司马迁则是从汉初子学演变出中世纪史学的史家。

本精神。秦代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是对先秦诸子学的沉重打击。汉兴，诸子学又一次复兴，历文、景、武各代，按侯外庐先生说法，是儒道“互绌”。其实，儒道法墨各家皆在“互绌”之中。武帝时期，大一统帝国汉王朝在亚洲东方出现，这个帝国在学术上也要求“汇于一”。但以什么途径“汇于一”，却有不同观点。一种是董仲舒主张的在“罢黜百家”前提下，独尊他的儒学，或者可称之为新经学；另一种是司马迁的“融汇众家之学，形成一种新的学说”。^[1]

经学的“经”的意义，可以有多种视角的解喻。从文本意义上说，在古代不多的文献中，“经”是有重大社会影响文献的原始文本，它和以后派生出来的各种相关文本，构成了体系。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为适应政治统治、道德垂训和风化教育的需要，经过“圣人”删定、编纂出来的文献，从而被推上“经”的宝座。此后，对这样文本的研究、增删、诠释，形成了经学；更由于观点差异在形式和内容上反映出来，因此产生了经学上的各种流派。

儒、道、墨等诸子各家大都有自己的经。儒家的经的组成，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各种组合。^[2]《论语》《孟子》等本来是“子”，只因需要，也成了经；《春秋》三传，明明是“传”，是解经的，由于需要，也可以列为经书。《周易》是儒家的经，却又是玄学“三玄”之一，是道家的经典。这些纷繁问题只能放在具体时代背景下进行解说。^[3]所谓经、子、史本来是搅在一起的，“经”成为“学”，“史”也成了“学”，并且与“子学”逐渐区分开来，是汉代学术发展的结果，也是汉代学术的进步与成就。这后面有它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汉代诸子学的变化促成了经

[1] 见拙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2] 参见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课《经学总述》，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一章，何耿镛《经学概说》等。

[3] 有的学人说：“经学的文字是客观地存在，但由文字所蕴涵的意义则须由人加以发现，而不是纯客观的固定的存在。发见常因人因时代而不同，所以经学意义的本身，即是一种进动地历史产物，对它必须作‘史地把握’，才可接触到它在历史脉搏中的真生命。”（《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这是看出了中间的道理。

学的产生与繁荣，也导致了中国的古代史学走向成熟。

汉初诸子即思想家，对历史兴亡的总结，着重从秦亡汉兴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而把上古直到汉代历史贯通起来思考，说明历史兴衰之理，发挥先秦思想家的重民思想、历史变革观点。正是在这种诸子学术涌动的大潮中，司马迁对诸子学做出了总结。他把自己的史学创作称作是“成一家之言”，从形式到内容、思想，进行了创新，在创造出来的通史性质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中，融进了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念，实践了自己的愿望。司马迁的史学以其鲜明的个性，从两汉诸子中裂变出来，成为新的一“家”。“史”之成“家”，始自司马迁。

诸子学的复兴，使得汉代历史思维达到很高的水平，^[1] 司马迁的易学继承先秦易学的通变思想，把自然的“天”与社会的“人”联系起来，考察历史兴衰之理。同时，接受《易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思维途径，^[2] 对先秦以来的诸子学、史学以及自然认识，进行总结。他吸收各家之长，成自己的一家之言，丰富的、务实的、联系的、辩证的历史思维，成为他的历史学理性基础。汉中期以后，孟喜、京房的易学是《易》之别传，宣扬天人感应观点，但他们把人事、历史与自然作为有联系的整体，使古代的整体历史思维以另一种模式表述出来。

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文字形体的差异、篇章的多寡、结构次序以及对典制诠释的不同，但实际上，是政坛上纷争的曲

[1] 西方有的学人说：汉代朝廷是正在出现的政治核心，它将争霸、争鸣的活力摄取到自身中来，并利用这种活力创造出极端重要的、规定性的中心，此中心将中国的疆域推进到空前的地步。以国家意识形态出现的汉代儒学，不是先秦的儒学，而是强化了、综合性的儒学，它摄取了道家、法家、墨家，以及可能与之竞争的任何一种其他学派的成分，加以消化吸收。（[美] 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中文版作者自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汉代学术具有强大的活力是通过思维特点体现出来的，这一学术潮流下形成的汉代史学，充满活力，反映出时代特征；大一统的民族凝聚力在史学中特别明显地反映出来。

[2] 贾谊的《新书》和《淮南子》的《汜论训》《泰族训》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等，分析诸子各家的长与短，讨论六艺的各自价值，但只有司马迁父子，把总结六家要旨、讨论六艺精神，与“成一家之言”作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来把握。



折反映。两汉君王牢牢控制讲经的大事，与儒生讲“五经”同异，“亲制临决”，绝不是附庸风雅。

如果说，汉代前期，君王与思想家着重想从秦亡汉兴历史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试图避免秦亡的事再次发生，那么，到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加深，在“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的情形下，更多的是要通过天人感应的教条，以求天下安稳。《史记》《汉书》就是产生在这一历史变动过程中。

前面说过，司马迁把自己一家言的要点，概括为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民族史学的基本特征形成了，民族史学思想走向成熟。但是他的史学并没有完成封建史学二重性的构建。所以，在扬雄、班固看来，司马迁的史学虽然具有实录精神，但没有把“六经”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是不能容忍的。

应该指出，两汉史学有多种形态，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吕氏春秋》是子也是史。董仲舒把自己的《春秋繁露》标明是“春秋”类的作品，它是经亦是史，是以史解经的形态，是史学另一种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后世义理史学之滥觞。

汉代中期以后，历史逼迫着一代思想家思考历史的前途，思考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两重性的需求比起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一方面，在严酷的兴亡历史面前，不能不尊重历史事实，为的是从历史兴衰中找到稳固统治的方略；另一方面，曲解历史，制造神意的天人感应理论，论说汉代政权存在合乎天意，也是政治上的需要。灾变说也有另一重意义，就是通过灾变的解说，可以对人间君王起到有限的警示作用。

今文经、纬书与谶纬神学扭结在一起，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掀起一股神学思潮笼罩着政坛、学坛，达到“宣汉”的目的。班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改造了《史记》，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的史学实录精神，创造出“十志”更好反映西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糅进神学“汉绍尧运”的一套理论，通过“宣”西汉，达到“宣”东汉的目的。史学二重性的构建完成，是班固的创造。白寿彝先生在论班固史学时，既没有说班固“抄”《史记》，也没有说班固“撰”《汉书》，而是用了顾炎武的

提法，称为“班固改《史记》”，这一个“改”字，说出班固的贡献所在。^[1]至于“改”得怎样，只能见仁见智，由人评说了。班氏的《汉书》因此成了中世纪的史书的范本，这不仅在于其断代为史的体裁，更在于其史学精神、史学思想的“二重性”特点。

本卷作为中国史学民族精神形成的一卷，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两汉史学，阐明了古代史学的二重性基本特征，又着力写出董仲舒对两汉史学的影响，补上这一笔，就把两汉诸子学、新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很有必要。中国历史学大潮浩浩荡荡向前发展，直到今天，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发展新世纪史学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示。读书当知其言，知其所以言。著述之事，盛矣哉！

[1] 顾炎武的《日知录·窃书》中说：“班孟坚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顾颉刚在《汉代学术史略》第十六章《古史系统的大整理》中谓秦汉学人包括班固在内进行对“古史系统的改造”。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教本》中论说班固时，特别将标题拟为“班固改《史记》”，是有深意的。（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目 录

题 记 / 1

导 言 / 1

第一节 秦汉社会与史学思想 / 2

第二节 两汉经学与史学思想 / 11

第 一 编

第一章 秦的统一与秦朝君臣的历史意识 / 31

第一节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 32

一、人法天地的天人一系论 / 34

二、天生人成的历史盛衰决定论 / 39

第二节 秦始皇的历史意识 / 44

一、以历史做借鉴，议定皇朝制度 / 45

二、刻石与焚书：政治对史学的利用和干预 / 51

第二章 陆贾、贾谊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 / 56

第一节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 56

一、“逆取而顺守”：对历史治乱兴衰的理解 / 59

二、“三圣”说与古今论：历史发展观的表述形式 / 67

第二节 贾谊对历史盛衰之理的探讨 / 71

- 一、“攻守之势异”：贾谊的“过秦”总结 / 73
- 二、“民无不为本”：贾谊仁政思想的核心 / 76
- 三、以礼治国：贾谊的政治历史秩序论 / 82

第三章 汉初黄老道家的史学贡献与史学思想 / 89

第一节 《淮南鸿烈》的历史哲学 / 89

- 一、历史阶段论 / 90
- 二、历史变易论 / 94
- 三、历史决定论 / 97

第二节 司马谈的史学贡献与史学思想 / 102

- 一、对《史记》的发凡起例 / 103
- 二、对学术史的总结与批评 / 107

第二编

第四章 董仲舒的历史思想 / 118

第一节 天人感应论及其内蕴的历史盛衰思想 / 120

- 一、天人感应论的理论渊源 / 120
- 二、天人感应论的基本内容 / 122
- 三、天人感应论的精神实质 / 128

第二节 “三统”说：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 132

- 一、“三统”说的基本内涵 / 132
- 二、“三统”说的精神实质 / 139

第三节 大一统说：董仲舒的政治历史秩序论 / 146

- 一、董仲舒大一统说的形上之义 / 146
- 二、董仲舒大一统说的形下之义 / 151

第五章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 163

第一节 “究天人之际”与司马迁的天人观 / 165

- 一、司马迁的重人事思想 / 165
- 二、司马迁的天命王权思想 / 169

第二节 “通古今之变”与司马迁的历史变易思想 / 174

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探寻历史变易的方法论 / 174

二、“《易》穷则变”与司马迁“承敝易变”的历史变革论 / 179

三、“三统”和“五德”终始之变与司马迁的历史循环发展观 / 182

第三节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 / 186

一、史书编纂体裁蕴含的大一统思想 / 186

二、《史记》对大一统政治的颂扬 / 189

三、民族观蕴含的大一统思想 / 194

四、“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学术思想大一统 / 197

第四节 司马迁对历史学的认识与实践 / 199

一、论载历史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 200

二、史学目的论的一家之言 / 202

三、历史编纂学的突出成就 / 205

第六章 刘向、刘歆的史学贡献与史学思想 / 210

第一节 刘向、刘歆的历史文献学贡献 / 212

一、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方法 / 214

二、历史文献的分类及其理论意义 / 216

第二节 刘向、刘歆灾异论的不同旨趣 / 222

一、刘向灾异论的基本旨趣 / 223

二、刘向、刘歆灾异论之异趣 / 231

第三节 刘歆的新五德终始说及其内蕴的历史思想 / 234

一、新五德终始说是刘歆而非刘向的历史学说 / 234

二、新五德终始说关于历史变易的解说 / 236

三、新五德终始说蕴含的历史思想 / 240

第 三 编

第七章 王充的历史发展思想 / 253

第一节 “汉盛于周”：王充的历史发展论 / 254

一、定立社会太平与否的评判标准 / 255

二、“汉盛于周”的具体表现 / 257

三、对是古非今论的批判 / 263

第二节 “德”“力”并重：王充的治国论 / 267

一、治国之道在于“养德”和“养力” / 268

二、“礼义之行，在足谷也”的道德论 / 270

第三节 治乱兴衰“皆在命时”：王充的历史决定论 / 273

一、“命时”决定论的基本内涵 / 274

二、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 278

三、“命时”决定论的理论缺陷 / 284

第八章 班固史学的二重性特征 / 287

第一节 班固史学二重性特征的形成 / 289

一、时代对于史学二重性的需要 / 290

二、班彪二重性史学的影响 / 293

第二节 《汉书》的“宣汉”旨趣与神意史观 / 298

一、历史编纂蕴含的“宣汉”思想 / 298

二、以神意史观解说汉朝统绪 / 301

三、宣扬天人感应说 / 306

第三节 《汉书》的实录精神与大一统意识 / 311

一、从对司马迁史学的评价看班固的实录意识 / 311

二、“上下洽通”，最大限度地反映有汉一代的历史及其变易 / 314

三、直书不隐，不为汉讳 / 319

四、民族史撰述内蕴的大一统意识 / 323

第九章 何休的历史思想 / 327

第一节 “三世”说：何休的历史发展学说 / 329

一、“三世”说的理论渊源 / 329

二、“三世”说的基本内涵 / 332

三、“三统”说及其与“三世”说的关系 / 335

第二节 “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大一统理想 / 341

一、何休对大一统形上义的阐发 / 341